

媒介學的（不）理論： 從基德勒與克蕾默爾的媒介存有論探問 媒介與技術的「在中間」

謝杰廷*

摘要

本文從媒介學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與希比耶·克蕾默爾（Sybille Krämer）對於技術以及媒介存有論的探問指出，媒介學所要反省／反對的是西方哲學脈絡下的理論知識對於技術的排除與忽視。媒介學因而並不是要為媒介建立理論，而是要分析理論、知識、以及文化之所以能被建立的技術。本文指出，在媒介學的觀點下，媒介就是技術——它們皆起於「在中間」，並打開「在中間的空間」，不只傳遞訊息，更造出技術物，是理論、知識與文化的預設。

關鍵詞：文化技術、亞里士多德、使者、建築、媒介哲學

投稿日期：2024.12.09 通過日期：2025.04.28

感謝匿名審閱者之建議，讓本文之論述更為完整、易讀。

* 謝杰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khora@nccu.edu.tw

The (a)theoretical *Medienwissenschaft*: On the “in-between” of medium and technique from Kittler and Krämer’s perspectives on the ontology of media

Chieh-Ting Hsieh*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Friedrich Kittler and Sybille Krämer’s analyses of technique and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ontology of media,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Medienwissenschaft*, which is often translated as “German media theories,” is intended to reflect on and fight against the ignorance of technique by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Western philosophy. The aim of *Medienwissenschaft* is not to develop theories for media but to analyze the techniques through which theories, knowledge systems, and cultures are constructed. This research also indicates that in *Medienwissenschaft*, medium is regarded as technique because they both, deriving from their “being-in-between,” open up “in-between-space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essag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artifacts as the preconditions for theories, knowledge systems, and cultures.

Keywords: Culture-technique, Aristotle, messenger,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of media

* **Chieh-Ting Hsie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ssistant Professor
khora@nccu.edu.tw

一間精神所造就的建築。
柯比意 (Le Corbusier, 1925, p. 163)

歡慶罷！我們贏了！
斐底畢德斯 (Pheidippides, Lucian, 1905, p. 36)

壹、導言：媒介學的「在中間」

媒介學 (Medienwissenschaft) 近年已逐漸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媒介」 (Medium/media) 更被理解為「技術」 (Technik/technique) 或「文化技術」 (Kulturtechnik/culture-technique, 唐士哲, 2017; 黃順星, 2017; Siegert, 2013, 2015; Winthrop-Young, 2013)。媒介學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德勒 (Friedrich Kittler) 提及的「技術的媒介」 (technische Medien) 清楚地呈現出了媒介與技術極為緊密的關聯 (Kittler, 1985)。許多媒介學與文化學研究者對於「技術」與「文化技術」的研究，更打開了「媒介」的意義：「媒介」能是記寫、算數、圖像，也能是點、線，又或是門、幕等 (Krämer, 2012; Krämer & Bredekamp, 2003; Siegert, 2015)。雖然，這些「技術」不像傳播學所說的「媒介」，然而，它們都是基德勒所說的「技術媒介」與媒介學所說的「文化技術」。在媒介學的觀點下，它們是建立起文學、哲學、知識以及文化的重要技術。基德勒將「文化」理解為訊息的網絡。然而，基德勒所討論的「文化」主要為哲學與文學。事實上，基德勒所受到的訓練比較是哲學與文學，而不是傳播學。在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等人的影響下 (Winthrop-Young, 2011)，基德勒最初的研究是文學與哲學的技術——他曾經以記寫的技術打開對於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與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的詮釋 (Kittler, 1985, 1986)。整體而言，媒介學所提出的文化技術指的是「建立文化的技術」 (Koch & Köhler, 2013)，也就是建立文化所需要的技術。

媒介學所提出的文化技術，其中的文化因而和哲學、文學有更為

緊密的關聯：媒介學研究者希格爾特（Bernhard Siegert）研究了卡夫卡（Franz Kafka）的文學，克蕾默爾（Sybille Krämer）研究了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學（Siegert, 1993; Krämer, 2016）。然而，希格爾特與克蕾默爾對於文學與哲學的研究，並不是爲了探問文學與哲學的意義，而是爲了探問哲學與文學的意義是以哪一些技術所建立的——其中最重要的技術即是「記寫」。整體而言，媒介學較不是起於傳播學，而更是起於文學與哲學。¹因而，此篇論文認爲，媒介學應該放在西方文學與哲學的脈絡下理解。事實上，無論基德勒、克蕾默爾或希格爾特都曾經探問媒介存有論（Ontologie/ontology）的問題。存有論是西方哲學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最重要的「理論知識」

（theoretische Wissenschaft/theoretical knowledge, Kittler, 2009; Krämer, 2008, 2017; Siegert, 2017）。「理論知識」指的是西方哲學脈絡下的「理論」（Theorie/theory），起於亞里士多德對於知識的分類下的「理論知識」，是「只爲了知而知」所探問的知識。媒介學會提出媒介的存有論，即是爲了與西方哲學對話。媒介學一方面關注極爲確切的「技術」（像是記寫、點、線、門、幕等），一方面關注極爲「理論」的哲學問題。媒介學因而能被理解爲在「理論」與「技術」的「中間」打開的研究。整體而言，媒介學所關注的文化技術就是建立起哲學與文學知識的技術。媒介學試圖探問建立起知識——特別是理論知識——卻又被理論忽視的技術。媒介學者因而特別關注記寫、算數與圖像的技術，而不限於傳播學經常關注的現代訊息傳遞的技術。對於媒介學而言，記寫、算數與圖像是建立起文化的關鍵技術。記寫更是其中最重要的技術，畢竟人們很難想像沒有記寫的文學與哲學。記寫的關鍵意義，清楚地呈現在基德勒的研究裡。他被翻譯爲英語的 discourse analysis 研究，即是對於「記寫系統」（Aufschreibesysteme）的研究（Kittler, 1985, 1985/1990）。「記寫系統」的德語爲 Aufschreibesysteme，其中的 Systeme 指的是系統，Aufschreiben 指的是記寫，Aufschreibesysteme 指的因而是將事物記寫下的「記寫系統」。

媒介學對於文化技術的關注是要反省「理論知識」——特別是哲學——對於技術的忽視與其所遭致的危險。因而，媒介學並不是要爲媒介建立理論。在這一個意義下，媒介學並「不是」媒介理論。媒介學關注理論之所以能被建立的技術。雖然，媒介學對於技術的關注經常被批

評為技術決定論，然而，將媒介學對於技術的關注批評為技術決定論，卻容易忽視「技術」即為媒介學對於理論知識反省的關鍵。此篇論文試圖將媒介學理解為對於西方「理論知識」的反省。媒介學是以對於文化技術的分析，反省理論知識對於技術的忽視，提示出理論知識仍須要技術。理論知識需要的技術則是文化技術，也就是建立文化的技術。雖然目前已有許多關於媒介學的討論，然而這些討論仍較少從哲學的脈絡討論「媒介」與「技術」的關聯。此篇論文將從西方的理論對於技術的忽視談起，並透過基德勒與克蕾默爾對於媒介、技術，以及特別是媒介存有論（Medienontologie/ontology of media）的觀點，將媒介學放入哲學的脈絡下，討論「媒介」與「技術」是怎麼打開一個「中間的空間」，並指出「媒介」與「技術」的緊密關聯就在於他們的「在中間」。

貳、理論的觀看：對於媒介的忽視

Medienwissenschaft（媒介學）經常被翻譯為英語的「德語媒介理論」（German media theories）。然而，「德語媒介理論」這一個翻譯卻或許會造成誤解。希格爾特指出，媒介學最初並未有確切的名稱，而被稱為「媒介分析」（media analysis），以替代當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與拉岡（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Siegert, 2015, pp. 1-2）。雖然，「媒介分析」的稱呼並未被保留，此一稱呼卻清楚指出了，媒介學所要做的即是媒介的分析。什麼是媒介的分析？為什麼媒介學想要分析媒介？為什麼將媒介的分析理解為「理論」或許會造成誤解？在此的「理論」指的是什麼？

媒介學是 Medienwissenschaft 的翻譯，指的是「媒介的知識」。其中，Medien 指的是媒介（複數），Wissenschaft 指的是知識——Wissenschaft 起於「知」的動詞，wissen，最直接的英語翻譯為 science。英語的 science 起於拉丁語的 scientia，scientia 是對古希臘語 ἐπιστήμη/epistemē 的翻譯，ἐπιστήμη/epistemē 與 scientia 則是分別

起於「知」的動詞，scire 與 ἐπίστασθαι/epistasthai (to know)，指的是知的知識。Wissenschaft 也是德語對於許多學門的稱呼，像是音樂學 (Musikwissenschaft)、舞蹈學 (Tanzwissenschaft)、劇場學 (Theaterwissenschaft) 等，指的是關於這一個學門的知識。因此，Medienwissenschaft 應該能被翻譯為媒介學，以避免落入認為媒介學就是媒介理論的誤解。媒介理論的翻譯會是對於媒介學的誤解，這是因為媒介學的媒介分析所要反省（或反對）的即是「理論」。

在此的「理論」指的是理論最初的意義：「觀看」(θεωρία/theoria)。「理論的觀看」指的則是一種特定的觀看：「旁觀」。像是受邀的使節觀看為了神所演出的劇場，因為他們只是訪客，並不參與當地的政治，他們的觀看即是「旁觀」(Ritter et al., 1971, p. 1128)。「旁觀」是一種不參與其中的觀看，所以旁觀者能看得更清楚。「觀看」的德語是 anschauen，anschauen 起於「看」(schauen) 卻又不只是看，而是指更深入的「看」所得到的「觀」。簡單而言，anschauen 更像是一種帶有整體理解的「觀」。在此的「觀」因而不只是對於現實的觀看。現實的觀看會受到觀看觀點的限制，所觀看到的必然是受到限制的。「觀」帶有的整體理解卻是不受限制的。在這一個意義下，「觀」是理論的「看」。理論的「看」是「旁觀」——「旁觀」的德語是 zuschauen，起於「看」(schauen)，「旁觀者」的德語 Zuschauer 也起於「看」，指的是劇場的觀眾。整體而言，理論是旁觀的觀看，隱含一種不參與其中，而將一切看得更清楚的觀看。

然而，對於媒介學而言，理論的觀看卻反而看不見媒介。更確切地說，理論看不見自己在觀看的媒介。回到理論最初即為「劇場的觀看」的意義，當理論的觀看像是劇場觀眾的旁觀，看不見媒介的理論就像旁觀的觀眾，看不見劇場是讓自己旁觀的媒介。為什麼旁觀的劇場觀眾總是看不見劇場是讓自己旁觀的媒介？因為只有當旁觀的觀眾不看見而看不見劇場這一個媒介，才能將自己旁觀的一切看成「真實」的，而不只是在劇場裡被呈現為像是真實的「想像」。換句話說，要能在劇場裡看到「真實」，只能忽視劇場這一個媒介。在此的「看不見」即是理論對於媒介的「忽視」。媒介學所要反省的，就是理論對於媒介的忽視。然而，為什麼理論的觀看會看不見自己觀看的媒介？

基德勒認為，西方理論對於媒介的忽視起於亞里士多德將媒介逐

出存有的探問外 (Kittler, 2009)。因而，西方理論對於媒介的忽視必須從西方哲學脈絡下——特別是起於亞里士多德——對於知識的分類談起。對於亞里士多德而言，知識能分為理論的、實踐的、技術的知識 (Barnes, 1995; Shields, 2007, 2012)。實踐的知識是關於「做出好的行為」，技術的知識是關於「做出技術物」。好的行為是關於人所能得到的美好的生命狀態。要能得到美好的生命狀態，需要好的行為，需要實踐的知識。技術物是關於人所能以技術做出的物——像是以建築技術造出的建築物。要能做出技術物，需要技術的知識。² 比起實踐與技術的知識，理論的知識卻不是為了讓人做出好的行為或技術物。理論的知識是為了知而知所探問的知識，因而不受限制的知識。換句話說，理論的知識是否能讓人做出好的行為或技術物，完全不重要。在這一個意義上，理論的知識並不受實踐與技術的限制。

理論知識的不受限制，更清楚地呈現在西方哲學對於存有的探問上。西方哲學對於存有自身的探問從不是為了要讓人做出好的行為或技術物，而是為了知而知的探問。對事物的存有自身的探問即為理論的知識，像是亞里士多德的「形上學」(Metaphysik/metaphysics) 以及哲學所談的「存有論」(Shields, 2007)。「存有論」是對於 *Ontologie* 的翻譯，其中，*onto-*指的是存有，*-logie* 起於 *λόγος/logos*，指的是談論。「形上學」則是對於亞里士多德的 *Metaphysik* 的翻譯。雖然，*Metaphysik* 聽上去很形而上，然而，*Metaphysik* 最初指的是「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 (*Physik*) 之後 (*meta*)」。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是對於物的運動變化的探問。³ 起於 *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ta meta ta phusika* 的「形上學」指的是「在物理學之後 (的探問)」(Barnes, 1995, pp. 66-108)。會有 *Metaphysik*，是因為它是在探問物的運動變化後，就物的存有自身去探問物的存有，也就是要將物的存有理解為存有去探問存有，從而探問物的運動變化之後的不動者／不變者。*Metaphysik* 因而變得像是在物之上的探問。形而上的探問，於是經常被認為是離開了現實的探問。事實上，無論是物理學或形上學的探問，都不是為了要做出好的行為或技術物，而只是為了知而知的探問，都是理論的知識。換句話說，它們都不是為了實踐或技術而探問的知識。在這一個意義下，它們確實與「現實」無關。整體而言，理論的知識和實踐與技術的知識不只有所分別，他們的分別更預設了理論的知識對於實踐與技術

的知識的排除。這一種排除事實上即是要排除實踐與技術對於理論的一切影響。只有當知識不是爲了實踐或技術而探問，理論的知識才能不受實踐或技術的限制。

因此，理論的知識排除實踐，更排除技術。理論對於實踐與技術的排除，清楚提示出了理論最初的意義：理論的觀看就是旁觀，旁觀就是不參與其中，因而無關於實踐與技術。要能探問實踐與技術的知識，就不能只是旁觀，而必須去「做」——無論是做出好的行爲或技術物。「旁觀」會是「旁觀」，就是不能去「做」。換句話說，只有當你不去做，才能旁觀，才能探問理論的知識。觀看，更確切地說，旁觀，是理論之所以是理論的意義。然而，現代對於知識的分類，只留有理論與實踐的知識。這一種現代知識的分類，忽視了技術的知識，更忽視了理論最初的意義即爲觀看，忽視了理論的觀看最初就是一種不參與其中的觀看，也就是旁觀，是爲了知而知的探問。因此，要理論關注實踐，從而去實踐理論，或是要實踐關注理論，讓理論被實踐，都是對於理論最初意義的遺忘。現代的研究者經常認爲，理論對於技術，又特別是對於實踐的排除，是理論的問題。然而，當現代的研究者認爲理論仍必須關注實踐，卻是已遺忘了理論與實踐最初是彼此排除的。當理論是能被實踐的理論，理論就已不是不受限制的知識了，理論也就不會是理論了。對於媒介學而言，理論的問題並不在於不關注實踐，而是對於技術的排除。媒介學認爲，理論的知識仍是技術所建立的。媒介學所要反省的就是理論的知識對於技術，特別是對於探問理論知識的技術的排除。在媒介學的觀點下，理論知識的探問不能沒有技術，理論的知識卻排除了技術，更排除了知識的技術。這不只是因爲理論的知識與技術的知識在最初就是彼此排除的，更是因爲理論的知識被認爲不應該受到技術的限制。對於媒介學而言，不需要技術的理論知識只是一種想像。

基德勒曾經清楚指出，古希臘的理論知識，不能沒有古希臘能同時標記出語言的聲音、音樂、以及數的記號，也就是像 γ 、 ρ 、 α 、 μ 等記號 (Kittler, 2013a)。當語言的聲音所喚起的就是生命以及人的存有時，能直接記寫語言的聲音的記號所喚起的，也就是生命以及人的存有。因此，當人們讀古希臘詩人荷馬 (Homer) 的詩篇時，在此的「讀」，並不會只是對於記號所指涉的意義的理解，而更是「聽」，也就是聽見

語言的聲音，以及聲音所喚起的生命與人的存有。簡單而言，當荷馬寫到人們的哭泣與吶喊，記號已不只是記寫，而是哭泣與吶喊的聲音，喚起人的存有所感受到的悲痛。古希臘的記號，就是古希臘建立知識的技術。在媒介學的觀點下，建立知識的技術卻已為知識預設了限制（precondition）。基德勒認為，因為古希臘的記號能直接以記寫喚起生命與人的存有的語言的聲音，所以古希臘人並未真的將記寫看成是媒介（Kittler, 2009, p. 24）。媒介因而被排除在存有的探問外。在建立知識的技術排除了媒介的意義下，技術就是知識的限制。在此，古希臘的記號是古希臘建立知識（像是存有論）的技術。然而，這一個技術卻已預設了媒介的排除。媒介的排除卻讓西方的理論從此忽視媒介。對於基德勒而言，理論的探問不能不關注技術，不能不探問知識的技術。Kittler 對於技術的探問提示出了，對於技術的排除，將會讓理論的知識陷入忽視技術對於知識的限制的危險。換句話說，研究者要是忽視技術，將容易忽視他所探問的理論的知識事實上仍受到知識的技術的限制。對於媒介學而言，認為理論的知識不受技術的限制只是一種錯覺。

因而，媒介學並不是要為媒介建立理論，反而是要以技術反省理論，反省理論對於技術的忽視。將媒介學翻譯為媒介理論會容易造成誤解。媒介學最初的稱呼「媒介分析」，或許才更能清楚地指出媒介學所要做的就是媒介的分析。媒介學的「媒介」指的則是「技術」（Technik/technique），特別是「知識的技術」（Technik des Wissens/technique of the knowledge），也就是建立起知識——特別是理論的知識——的技術。簡單而言，媒介學所要探問的「媒介的知識」即為「知識的技術」。媒介學所要分析的即是技術是怎麼建立起知識的。在這一個意義下，媒介學的知識是關於「建立起知識的技術」的知識（Wissenschaft der Technik des Wissens/knowledge of the technique of knowledge）。媒介學所探問的「技術的知識」因而與亞里士多德分類下的「技術的知識」有所不同。

在亞里士多德對於知識的分類下，技術的知識探問的只是關於要怎麼做出技術物的知識，像是建築的知識就是關於工人是怎麼造出建築的知識。然而，媒介學所要探問的不只是技術的知識，更是知識的技術，也就是建立理論的知識的技術。媒介學認為理論的知識與技術

的知識是有所分別的，只是它的分別，不應該是它們彼此的排除。後者反而是前者的預設。換句話說，對於媒介學而言，技術物的做出反而是理論的知識能被建立的預設。在媒介學的觀點下，就算是建築的知識，也能是理論知識的技術的預設。雖然建築技術的知識像是與理論的知識完全無關——至少在亞里士多德對於知識的分類下，它們完全不同。然而，建築是否真的與理論的知識無關？當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提到他要建立理性的建築時，在此的建築或許並不只是隱喻，而更是預設：必須先有實際以石塊造出建築的技術，概念才能像是建築的石塊從下而上建立起概念的系統（Gleiter, 2015）。建築是否更是現代的訊息理論（Informationstheorie）的預設？基德勒曾經指出，城市就是媒介（Kittler, 2013b）。城市的建築預設的是建築的技術，無論是管線、路線等網絡的系統等，它們都是訊息理論的預設。訊息理論裡的門（gate）、港（port）等，預設的也是建築的技術與網絡的系統。基德勒提到，數學研究者諾曼（John von Neumann）因而直接以建築稱呼他所建立的計算機模型（同上引）。在這一個意義下，建築的技術就是建立訊息理論的預設（Jany, 2013）。基德勒的分析提示出了，建築城市的技術就是媒介的技術的預設。整體而言，媒介學並不只探問技術，更探問知識的技術。雖然，媒介學指的是媒介的知識，然而，這並不是要為媒介建立理論的知識，而是要探問建立知識的技術所預設的技術的知識。

叁、在中間：媒介與技術

「媒介」與「技術」的關聯，在媒介學的觀點下，仍有更多複雜的意義須要更深入的討論。媒介學會將技術理解為媒介，是因為無論是技術或媒介，它們皆起於「在中間」而有「在中間」的意義。「在中間」指的是什麼？「在中間的媒介」與「技術的在中間」是否有所不同？以下將以古希臘雕刻家／建築師斐底亞斯（Phidias）為了造出帕德嫩神廟（Parthenōn）而召集的工人，以及為了傳遞雅典（Athēnai）勝利的訊息而死亡的古希臘使者／跑者斐底畢德斯（Pheidippides），討論「技

術的在中間」與「在中間的媒介」的意義，從而以更深入的分析指出，媒介仍涉及技術物的做出，技術仍涉及訊息的傳遞。因此，媒介學的「媒介」仍是基德勒所說的「技術的媒介」。

一、技術的在中間

技術起於「在中間」。然而，技術所在的中間指的是技術所打開的一個在中間的空間。這一個在中間的空間並不是能被精準量測的空間——不像是在雅典與斯巴達（Spárta）的中間有一個能被精準量測出距離的既有空間——，而是「做」的空間。像是建築的技術所打開的一個以石塊做出建築物的空間，一個操演的空間。⁴ 在此的操演是 operation，起於拉丁語的 operari，指的是做活／做工（work）。操演的空間因而是「做的空間」。為什麼這個「做的空間」是在中間的空間？這是因為，技術的「做」是為了要做出「技術物」。技術起於 τέχνη/technē，指的是技藝（crafts）或藝術（arts）。在此的藝術並不是指現代意義下的藝術作品，而是起於拉丁語的 ars，最初指的是連結、結構的技術，在德語則保留為 Art，有做法、法則等意義。技藝起於 craft，最初指的是載運貨物的船，在德語則保留為 Kraft，有效力、能力等意義。整體而言，技術指的是做出技術物的技術。為了要做出技術物，技術的「做」須要按特定的做法、法則，才有能力、效力，將物連結、結構為另一個技術物。

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技術的「做」與實踐的「做」有所不同。技術的知識是關於做出技術物，實踐的知識是關於做出好的行為，前者的做是為了做出另外一個技術物，後者的做卻不是。更確切地說，當人們做出好的行為，行為的「好」已經在行為的「做」裡，行為則已是「做」。換句話說，好的行為不是另外一個被做出的技術物，而就是行為的「做」。然而，技術卻是為了造出另外一個技術物。技術所打開的「做」的空間，則是在物與以物所做出的技術物的「中間」，是一個「在中間」的空間。像是建築技術所打開「在中間」的空間，就是在石塊與以石塊所造出的建築物的「中間」。這一個「在中間」的空間，並不是能被精準量測的空間，這一個「做」的空間卻仍是確切的空間。

當古希臘的斐底亞斯召集古希臘的工人以石塊造出帕德嫩神廟時，石塊必須先被開鑿、被切割、被接合，要能開鑿、切割、接合石塊，石塊必須先被量測、運送、吊掛，這一些都須要「做的空間」。⁵造出帕德嫩神廟的技術所打開的即是這一些「做的空間」：石塊必須先從礦場被開鑿，考量石塊的運送極為昂貴，石塊必須在運送前先按設計切割成適當的大小（在此，適當的大小並不是石塊最後的大小，而須要先預留一些空間，讓石塊能在運送到工地後，最後按設計被切割為精準的大小）。要能切割，石塊必須先被量測。在石塊被切割為適當的大小後，石塊要以車或船，沿著路或海，運送到工地。要能以車或船運送石塊，當然須要先造出車與船。到工地後，石塊又必須被量測，才能切割為更精準的大小，按設計定位、按設計接合。要能將所有的石塊定位，必須以繩索吊掛。要能將所有石塊接合，必須以鐵鍵埋入在石塊上所預留的溝縫。石塊要以繩索吊掛，以鐵鍵接合，當然必須先造出繩索與鐵鍵。更重要的是，石塊的開鑿、量測、切割，必須先造出鑿、錘、尺、規。無論是鑿、錘、尺、規，或繩索、鐵鍵、或車、船也都是技術物。做出這一些技術物的技術，也都需要「做的空間」。整體而言，從開鑿石塊的礦場，運送石塊的車、船與路、海，吊掛並接合石塊的工地，以及工人拿著尺、規去量測石塊、工人拿著錘、鑿去切割石塊的身體所需要的空間——無論是工人的手的揮動、肩的轉動、背的引動所需要的空間——都是技術所打開的「做的空間」。

因此，雖然技術所打開的在中間的空間不能被精準量測，然而，這些空間反而比能被精準量測的空間更確切，因為這些空間是身體的空間、物的空間，是技術所打開的「做的空間」。「做的空間」就是「在中間」的空間：在礦場與工地間，在車、船與路、海間、在工人的身體與鑿、錘、尺、規間，在石塊與建築物間。技術物的「做出」已預設這一些在中間的空間。換句話說，這些在中間的空間是技術物之所以能被做出的預設。在技術是打開在中間的空間的意義上，技術就是媒介。技術所媒介的是礦場與工地、車船與陸海、工人的身體與鑿、錘、尺、規。整體而言，技術就是石塊與建築的媒介。

然而，媒介的技術卻總是隱藏自己。當技術物被做出，人們只看見技術物，而看不見做出技術物的技術。當現在的人們看見帕德嫩神廟，人們只看見建築，而看不見工人是怎麼以石塊造出建築物的。技

術所打開的在中間的空間，在礦場與工地、車船與路海、到工人的身體與鑿、錘、尺、規間的空間都已不見了。「做」的空間已不見了。因為當技術物被完成，技術就不重要了。當帕德嫩神廟被造出，技術所打開的「做的空間」已不見了。人們已看不見「做的空間」。「做的空間」會消失，是因為做的空間只是為了技術物的「做出」。當技術物被做出，「做的空間」就不被需要了。技術的隱藏自己，則讓技術總是被忽視。技術的被忽視，卻讓技術物像是不受技術限制的「理論」。當人們越是看不見造出帕德嫩神廟的技術，它的美就越是讓人驚嘆，因為人們很難想像它是怎麼被造出的。它的美因而成為無人能及的美。無人能及的美讓帕德嫩神廟就像為建築所建立的理論知識。這清楚地體現在現代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對於帕德嫩神廟的感受裡：它就像「一間精神所造就的建築」（une pure création de l'esprit, Le Corbusier, 1925, p. 163）。在此的「精神」指出了帕德嫩神廟的美不像是人所造的。更重要的是，在此的精神，顯然是對於身體的忽視，對於理論的知識所排除的技術的忽視。這就是為什麼帕德嫩神廟總是像一個謎（enigma）——因為它已不像是人所造的——人們已忘記了它是怎麼被造出的。在這一個意義下，它的美是無人能及的。帕德嫩神廟就像不受技術的限制而為建築所建立的理論知識。帕德嫩神廟也曾經出現在基德勒提及文學家雷納德（Maurice Renard）的小說裡：當小說裡的音樂家內瓦爾（Nerval）為了要完成他想像的音樂而受盡折磨時，他提到了帕德嫩神廟與召集工人的斐底亞斯（Kittler, 1986, pp. 82-87）。顯然，對內瓦爾而言，帕德嫩神廟代表的是無人能及的美，斐底亞斯代表的是無人能及的技術，他想要完成的卻是音樂的帕德嫩神廟。然而，這是他所無法完成的，因為帕德嫩神廟與斐底亞斯都是無人能及的。他最後因而只能死去。在技術是理論知識的限制的意義下，理論的知識只能忽視技術。

二、在中間的媒介

媒介（Medium）就像技術，也是起於「在中間」。「在中間」指的是在物（things）的中間，也就是在物的存有（beings of things）中間。

換句話說，媒介最初指的是一個「在中間的空間」(space in-between)。⁶「在中間的空間」則是「空」的，而空間的「空」就是「不存有」。在這一個意義上，媒介不是「存有」，而是在存有與存有間的「不存有」。因此，要探問媒介的「存有」，必然會先碰上「不存有」。媒介起於古希臘語的 τὸ μεταξύ/to metaxu，μεταξύ/metaxu 指的是 between 或 in-between，無論是 in 或 between 卻都不是「物」。更確切地說，它們並不指涉「物」，而是指涉「物」所在的空間——或是「在其中」，或是「在其間」。在 μεταξύ/metaxu 並不指涉「物」而只是指涉「物所在的空間」的意義上，μεταξύ/metaxu 是「空」的。μεταξύ/metaxu 要成為媒介，只能在 μεταξύ/metaxu 前面加上 τὸ/to，才能讓「在中間的空間」成為「在中間的媒介」，而這正是亞里士多德在探問人的「感受」(αἴσθησις/aisthēsis) 時所提到的「媒介」(τὸ μεταξύ/to metaxu/the in-between)。亞里士多德將「媒介」理解為「感受的媒介」。在此的「媒介」已不是「在中間的空間」而是「在中間的媒介」。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感受須要有「媒介」的傳遞——就像光或聲音等，都需要像是空氣或水的傳遞，否則人將無從感受 (Kittler, 2009)。空氣或水就是在人與光或聲音中間的「感受的媒介」。整體而言，亞里士多德不接受「真空」或「空無」。對於亞里士多德而言，「在中間的空間」不會是「空」的，必須「有」傳遞的媒介，人才能有感受。因而，亞里士多德為 μεταξύ/metaxu 加上了 τὸ/to，以 τὸ μεταξύ/to metaxu 指稱「感受的媒介」。在此，「感受的媒介」已不是「不存有」而是「存有」。讓「在中間的空間」成為「在中間的媒介」，就是要讓「不存有」成為「存有」。基德勒指出，亞里士多德讓媒介「已不只是空無」(no nothing more)，而亞里士多德讓「在中間的空間」成為「在中間的媒介」隱含的是西方對於「存有」的執著 (同上引)。

雖然，亞里士多德所提到「感受的媒介」已是「存有」，然而，基德勒所要探問的「媒介的存有」卻不是「感受的媒介」。對於基德勒而言，當亞里士多德將媒介理解為「感受的媒介」，他仍只是將「媒介」逐出了存有的探問外，讓媒介受到理論的忽視。⁷ 什麼是對存有的探問？亞里士多德的形上學即是對存有的探問，是以物的存有自身去探問物的存有。整體而言，形上學要探問的是物的運動變化之後的不變者／不動者。然而，感受卻是變動的。因此，要是只探問感受的媒介，

仍只會是在存有論外探問媒介。更重要的是，雖然，亞里士多德所提到的「感受的媒介」——也就是傳遞聲音或光而讓人能有所感受的空氣或水——已是存有，然而，在此的「媒介」卻仍是「穿透的」

（διαφανής/diaphanēs/transparent, Alloa, 2020, p. 158; Johasen, 1997, pp. 116-147）。「穿透」指的是「能讓自身被穿透從而讓物被看見」（that through which something can be seen）。簡單而言，亞里士多德所提到的感受的媒介是讓自己被穿透從而讓物被看見的媒介。換句話說，感受的媒介並不是要讓自己被看見，而是要讓物能被看見。為了讓物能被看見，媒介必須讓自己不被看見。因此，人們總是看不見媒介，而只看見媒介所媒介的物。只有當人們看不見媒介，人們才能看見媒介所媒介的物。在此，已能更清楚地理解，為什麼基德勒會認為，當亞里士多德將媒介理解為感受的媒介，反而是將媒介逐出了存有的探問外。雖然，亞里士多德的感受的媒介已是存有，然而，感受的媒介仍只是關於看見，而不是關於存有自身。更重要的是，雖然，媒介從不存有成為了存有，然而，媒介還是失去了自身的存有，因為媒介只是為了讓人們看見它所媒介的物。

媒介的不讓自己被看見，就是克蕾默爾所清楚提到的，媒介總是隱藏自己：媒介必須隱藏自己才能讓它所媒介的物被看見（Krämer, 2008）。就像人們總是只看見被傳遞的訊息，而看不見傳遞訊息的人。在這一個意義下，傳遞訊息的人總是隱藏自己。然而，媒介不只是在隱藏自己，對克蕾默爾而言，媒介更是在折損自己而走向消亡。克蕾默爾因而提到了古希臘的斐底畢德斯（同上引）。傳說斐底畢德斯為了要盡快將戰況的訊息帶回雅典，他從雅典跑到戰場，隨即從戰場跑回雅典，當他一回到雅典，說完「歡慶！我們贏了！」（χαίρετε νικῶμεν/chairete nikomen）就隨即倒下而死去（Lucian, 1905, p. 36）。傳說他已在戰前為了請求支援，先從雅典跑到斯巴達，又從斯巴達跑回雅典。斐底畢德斯因而在幾天內就跑了大約 300 哩（Lucas, 1976）。或許沒有什麼比為了訊息的傳遞而死去的斐底畢德斯，更能清楚地體現媒介的折損而消亡了。然而，就是因為媒介總是不讓自己被看見，總是隱藏自己，為了要探問媒介的存有，克蕾默爾回到最初的媒介，也就是「使者／訊息的傳遞者」（Bote/messenger）而提到了斐底畢德斯（Krämer, 2008）。畢竟，無論媒介怎麼隱藏自己、不讓自己被看見，

斐底畢德斯這一個訊息傳遞者的身體卻清楚地體現了媒介的存有。然而，克蕾默爾指出，斐底畢德斯的身體是會折損而消亡的。在媒介總是折損自己而消亡的意義上，媒介的存有仍是到向不存有。當訊息已被傳遞，媒介就已不重要了。在斐底畢德斯的傳說裡，當訊息已被傳遞，斐底畢德斯就能死去了，斐底畢德斯也就死去了。斐底畢德斯的死去，就是存有的到向不存有。

當然，斐底畢德斯會死去，不只是因為訊息已被傳遞，更是因為他在幾天內跑了 300 哩。這讓斐底畢德斯折損而消亡的 300 哩就是媒介所打開的「在中間的空間」。斐底畢德斯是在雅典、斯巴達與戰場中間的媒介。為了訊息的傳遞，斐底畢德斯只能在中間不停地跑。他先是從雅典跑到斯巴達，隨即從斯巴達跑回雅典，又從雅典跑到戰場，隨即從戰場跑回雅典，為的是要盡快帶回戰況。斐底畢德斯因而總是在中間，也就是在雅典、斯巴達與戰場的中間，他只能不停地跑。這 300 哩並不是被精準量測出的空間，而是斐底畢德斯的腳步所跑出的空間。事實上，「哩」最初的意義是 1000 步。在這 300 哩是斐底畢德斯所跑出的意義上，「在中間的空間」是媒介所打開的。媒介的技術打開了一個在中間的空間。這個在中間的空間是傳遞訊息的預設。換句話說，訊息的傳遞總是已預設了一個在中間的空間。要是沒有在中間的空間，訊息也就不須要傳遞了。因此，媒介的技術不只是訊息的傳遞，更是打開一個在中間的空間。

肆、媒介的技術與技術的媒介

到此，已能更清楚地理解媒介學觀點下技術與媒介的緊密關聯。媒介與技術都是起於「在中間」，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打開了一個在中間的空間。媒介學會將媒介理解為技術，就是因為無論是訊息的傳遞或技術物的「做出」都預設了一個在中間的空間。雖然，媒介與技術皆是起於「在中間」而有「在中間」的意義，克蕾默爾卻認為媒介與技術仍有所不同，因為技術是關於技術物的「做出」，媒介卻只關於訊息的傳遞，而無關於技術物的「做出」(Krämer, 2008)。然而，媒介是否真

的只是關於訊息的傳遞，而無關於技術物的「做出」？克蕾默爾的問題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技術是否只是關於技術物的「做出」，而無關於訊息的傳遞？此篇論文將以斐底畢德斯傳遞雅典戰勝的訊息指出媒介仍涉及技術物的「做出」，從而探問「媒介的技術」，並以斐底亞斯召集工人造出的帕德嫩神廟指出技術仍涉及訊息的傳遞，從而探問「技術的媒介」。整體而言，「媒介的技術」指的是媒介所涉及的「技術物的做出」，「技術的媒介」指的是技術所涉及的「訊息的傳遞」。

此篇論文認為，媒介並不就不涉及技術物的「做出」。回看斐底畢德斯，雖然斐底畢德斯不像造出建築物的工人會做出技術物，然而斐底畢德斯傳遞的訊息仍有「造」的意義。在此的「造」不像是建築物的「造出」，卻仍有「造就」(perform)的意義。對於戰況完全無知的雅典人而言，斐底畢德斯傳遞的訊息已是「事實」(the actual)。這並不是說，在戰場上「現實」(the factual)的戰況並不重要，而是要說，對於等待戰況的雅典人而言，斐底畢德斯的訊息已「造就」一個「事實」。在談「事實」在此的意義前，先談「造就」在此的意義。事實上，「造就」的意義已隱現在斐底畢德斯所說的第一個詞裡：歡慶(χαίρετε/chairete)！在此的「歡慶」為 χαίρετε/chairete，是起於 χαίρω/chaíro 命令(imperative)的格位，chaíro/χαίρω 指的是歡愉、歡快(delight)。在此，命令的格位則是一種祝語，清楚地呈現出哲學家奧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所說的「語言的述行」(performative)，指的是語言從不是只表述，更能是造就事實的行動(Austin, 1962)。斐底畢德斯的「歡慶」，這一個命令的格位，就是「要」所有人歡慶，因為「我們贏了！」。「歡慶」因而是斐底畢德斯所造出的事實。然而，在此的「事實」指的較不是「擬真的事實」(the virtual)，而是關於一種以行動所「實現的事實」(the actual)。在此的行動指的是奧斯汀意義下的「表述所能造就事實的行動(performance)」。在此的「事實」(the actual)隱含「實現」(actualize)的意義，「實現」起於 actus，指的是「行動」。在奧斯汀的意義下，訊息是能造出事實的。訊息因而並不像克蕾默爾所提到的不能做出技術物。「事實」就是訊息所做出的「技術物」。更重要的是，斐底畢德斯並不是先說「我們贏了」，而是先說「歡慶」。「歡慶」的命令格位所先造就的是歡慶的事實。雖然，對於斐底畢德斯而言，或許是因為「我們贏了，所以要歡慶」，然

而，對於雅典人而言，歡慶卻是斐底畢德斯的訊息所先造就的事實。在這一個意義下，反而是歡慶的命令先造就歡慶的事實，從而讓雅典人確認是「我們贏了」。因此，從語言的述行分析斐底畢德斯的訊息所造出的事實，並不是「我們贏了，所以歡慶」，更是「歡慶，所以我們贏了」。然而，斐底畢德斯的訊息要造出事實，卻仍需要斐底畢德斯所打開的在中間的空間。換句話說，斐底畢德斯的訊息會有意義，就是因為他跑到了戰場，又從戰場跑回雅典，他傳達的是關於他所到過的戰場的訊息。一個從未到過戰場的雅典人和另一個雅典人說，「歡慶，我們贏了！」，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這一個訊息不能命令，更不能造出事實。因而，斐底畢德斯所跑出的 300 哩，是讓他所傳達的訊息能「造就」歡慶的預設。當斐底畢德斯死去，當雅典人歡慶，斐底畢德斯的訊息所造就的事實也就成為了真實。在這一個意義下，媒介不只是打開一個在中間的空間，這一個在中間的空間，更是讓訊息能造出事實的預設。

媒介傳遞的訊息能造出事實更清楚地呈現在詞語（words）上。一個詞語是一個訊息，因為詞語已有所指涉。詞語所指涉的意義即是這一個詞語的訊息。然而，詞語卻不只能傳達訊息，更能造出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哲學因而就像「詞語」所造出的「技術物」。詞語與文學或哲學就像石塊與建築，以詞語造出文學或哲學就像以石塊造出建築。當詞語造出文學或哲學，文學或哲學已不只是關於詞語所傳遞的訊息，而更是詞語所造出的另一個「真實」——就像是斐底畢德斯傳遞的訊息所造就的「事實」而成為的「真實」。無論是文學或哲學，人們所讀到的已不只是個別的詞語所要傳遞的訊息。就像荷馬的詩，從不只是爲了要傳遞訊息，而是要造就一個「真實」。當荷馬寫到人的吶喊與哭泣，並不是要傳遞「有人在哭泣與吶喊」的訊息，而是要讀者聽見吶喊與哭泣的聲音，喚起人的存有所感受到的悲痛。悲痛就是荷馬所造出的「真實」。因而，對於基德勒而言，讀者不只是讀荷馬的詩篇，更是聽見吶喊與哭泣的聲音。聽見吶喊與哭泣的聲音所感受到的悲痛，即是詞語所造出的「真實」——文學所造出的「真實」。在此的「真實」無關於「現實」，而是起於「事實」。當讀者感受到悲痛，事實也就成為了「真實」。在媒介學的觀點下，哲學所要探問的「真實」也是詞語所造出的。簡單而言，詞語並不只在傳遞訊息，更能造就事實，從而造就真

實。因此，媒介仍涉及技術物的「做出」。媒介仍能像是技術造出技術物。文學與哲學，事實與真實，都是媒介所能造出的「技術物」。

然而，要是詞語與文學或哲學就像石塊與建築，石塊與建築是否也就像詞語與文學或哲學？這一個問題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建築的技術是否無關於訊息的傳遞？此篇論文認為，技術並不就無關於訊息的傳遞。回看斐底亞斯召集的工人，雖然，斐底亞斯召集的工人不像斐底畢德斯會傳遞訊息，然而，爲了造出帕德嫩神廟而必須開鑿、切割、接合的石塊，卻仍是「訊息」。對於工人而言，石塊已有訊息的傳遞。不難想像，當工人在開鑿石塊時，仍必須從石塊上讀出石塊傳遞的「訊息」：石塊是否固實？是否容易碎裂？是否輕？是否重？是否有溝痕、隙縫？因此，鑿、錘是否應該避開溝痕、隙縫？鑿、錘是否應該從溝縫、隙縫切入？石塊是否會碎裂？要能將石塊開鑿成適當的大小，工人就要能讀出這一些訊息。和荷馬的詩篇不同，在此，工人是以鑿、錘去讀出石塊所傳遞的訊息。更確切地說，工人是以身體去讀出石塊的訊息。無論是石塊的切割、接合，或石塊的量測、運送、吊掛，工人要能先讀出這些訊息，才能以石塊造出建築物。當建築物被造出，石塊仍涉及訊息的傳遞。石塊仍像詞語，以石塊造出的建築物仍像以詞語所造出的哲學或文學。帕德嫩神廟不就讓柯比意讀出了「精神」？帕德嫩神廟因而就像「理論」，是爲建築所建立的「理論的知識」。在這一個意義上，建築就是以石塊所造出的理論。因此，做出技術物的技術並不就不涉及訊息的傳遞。技術仍能像是媒介傳遞訊息。建築，精神與理論，就是技術所能傳遞的訊息。

伍、結論：媒介學的（不）理論

整體而言，媒介學並「不是」理論，因爲媒介學不是要爲媒介建立理論，而是要以媒介的分析去反省／反對理論對於技術的忽視。在此的理論指的是理論的知識，而媒介指的是技術。媒介與技術都起於「在中間」而有「在中間」的意義。媒介與技術的「在中間」卻讓它們受到西方哲學脈絡下的理論——又特別是存有論——的忽視。換句話說，就

是因為媒介學要反省的是理論對於技術的忽視，媒介學從不是要為媒介建立理論。在這一個意義下，媒介學「不是」媒介理論。媒介學所提示出的是：理論的知識仍是技術所建立的，更重要的是，技術就是理論知識的限制。因此，對於媒介學而言，沒有理論的知識是沒有技術的，沒有理論的知識是沒有限制的。然而，媒介學並未遺忘理論所要探問的是不受限制的知識。媒介學並不認為理論的問題在於理論的不關注「實踐」，而是在於理論對於「技術」的排除。

必須留意的是，媒介學對於理論的反省，仍是為了理論。媒介學仍是為了理論的不受限制而反省理論。事實上，媒介學仍是理論的觀看。媒介學仍是以理論的觀看去旁觀理論的觀看。要是理論的觀看就像劇場觀眾的觀看，只能忽視「劇場」這個媒介，才能看見劇場裡的「真實」，則媒介學不只是要成為劇場的觀眾，更是要成為劇場以及劇場觀眾的旁觀者，從而指出，劇場觀眾所看見的真實，不能沒有劇場這一個媒介，更重要的是，劇場這個媒介就是觀眾所看見的「真實」所預設的技術。要是忽視了讓人看見「真實」的媒介，劇場觀眾所看見的「真實」仍就只是錯覺。因而，媒介學關注理論所忽視的技術。然而，在媒介學仍就是劇場以及劇場觀眾的旁觀者的意義下，媒介學仍在「旁觀」。在此的「旁觀」仍是理論的觀看。因而，媒介學仍「是」理論。在這一個意義下，媒介學仍是為了探問不受限制的知識而探問知識的限制。事實上，基德勒或克蕾默爾探問的仍是媒介的存有論，而存有論仍是理論的知識。這清楚指出了，媒介學雖然反省理論的知識，卻並未拋棄它。基德勒或克蕾默爾會探問媒介的存有論，仍是試圖將「媒介的知識」理解為「理論的知識」。在此，「媒介的知識」指的就是關於「建立起知識的技術」的知識。因而，當媒介學以對於技術的探問指出，沒有知識是沒有技術的，沒有知識是沒有限制的，這卻就是媒介學所提示出關於媒介的「真實」以及關於媒介的「理論知識」。

因此，要是只將媒介學對於技術的關注理解為技術決定論，將會忽視技術是媒介學反省理論知識的關鍵。媒介學對於技術的分析是為了要反省理論的知識——特別是文學、哲學以及起於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知識——對於技術的忽視。媒介學提示出了，柯比意從帕德嫩神廟所讀出的「精神」，仍是斐底亞斯召集的工人在讀出石塊傳遞的訊息後所造出的；雅典人的歡慶，仍是在幾天內跑了 300 哩的斐底畢德斯在訊

息的傳遞後的死亡所造出的。爲了成就精神與歡慶，須要償付的代價是人的身體與身體的死亡。精神與歡慶不能沒有人的身體與身體的死亡，就像理論的知識不能沒有技術，不能沒有總是隱藏自己，又或是折損自己而走向消亡的媒介。

註釋

- 1 整體而言，「媒介學」與「傳播學」仍有所不同，這清楚地呈現在德語上：前者的德語是 Medienwissenschaft，後者的德語是 Kommunikation-Publistikwissenschaft，其中 Kommunikation 指的是傳播，Publistik 指的是面向公衆、大衆，並對於公衆、大衆有廣大影響的傳播媒介。Kommunikation-Publistikwissenschaft 因而較接近臺灣所知的傳播研究。媒介學關注的是「技術」，更確切的說，即是此篇論文所說的「知識的技術」，傳播學關注的則較是訊息的「意義」——像是「意義」怎麼在政治、文化的脈絡下被詮釋等。對於基德勒而言，比起訊息的「意義」，訊息的傳遞所涉及的「技術」——像是他所分析的「記寫系統」(Aufschreibesysteme)——更是建立知識與文化的關鍵。希格爾特因而指出，比起傳播學關注「意義」，媒介學更關注「無意義」(Siegert, 2015)。在此的「無意義」指的是在意義前仍未有意義卻能建立意義的技術。媒介學近年所提出的「文化技術」(Kulturtechnik) 接續的就是基德勒所探問的(知識的)技術。關於傳播學與媒介學在研究觀點與脈絡上的不同，見 Siegert, 2015, pp. 1-15; Friesen, 2016。
- 2 在亞里士多德對於知識的分類下，實踐的知識涵括了政治學；技術的知識涵括了詩學與修辭學。對於亞里士多德而言，詩學是關於造出好的藝術的知識，修辭學是關於造出好的論述的技術，因而也是屬於技術的知識。關於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與詩學，見 Barnes, 1995, pp. 250-285。
- 3 亞里士多德的 Physik/physics 雖然在現代經常被翻譯爲物理學，然而，Physik/physics 起於古希臘文的 φυσικά/phusika，指的就

是自然。然而，在此的自然並不是現代意義下被理解為與人對反的自然，而是關於物的運動變化——就像是物的生成與消亡。關於亞里士多德的 *Physik/physics*，見 Stavrianeas, 2015。

- 4 操演空間 (Operationsraum) 是克蕾默爾在分析記寫的技術時提出的觀點，最初指的是記號在紙上的操演所打開的空間——像是算數、幾何、圖表等 (Krämer, 2005)。
- 5 許多關於帕德嫩神廟建築的研究，都是關於建築比例的分析，卻少有關於建築工程等技術的研究。對於建築比例的關注，事實上也清楚地呈現出了建築工程等技術在西方建築／藝術理論研究所受到的忽視。關於帕德嫩神廟建築工程等技術的研究，見 Burford, 1963; Wycherley, 1978, pp. 105-141; Korres, 1995。
- 6 「在中間」或「在中間的空間」(Zwischenraum/in-between-space) 也是近年許多媒介學研究者所關注的關鍵問題 (Dotzler & Schmidgen, 2008; Sternagel & Schürmann, 2024)。此外，媒介學的「在中間／在中間的空間」與人類學的「中轉空間」(liminal space) 隱含的關聯也值得後續的研究。「中轉空間」起於人類學研究者馮傑內普 (Arnold van Gennep) 的研究。馮傑內普的研究指出，宗教的節慶與祭儀總是涉及「轉變」(transition) 的過程，「轉變」的過程總是涉及像是門、門檻等「在中間」的空間 (van Gennep, 1960; Thomassen, 2014)。在此將 liminal space 翻譯為「中轉空間」是因為 liminal 起於拉丁語的 limen，指的就是「門檻」(threshold)，「門檻」就是「在中間」的空間，而「在中間」的空間對於馮傑內普而言就是引起「轉變」的空間。希格爾特也曾經提到「門」對於宗教的意義，他是在媒介學的觀點下將「門」理解為「文化技術」，分析「門」的操作怎麼建立起門內／門外、有法則／未有法則的空間，從而建立起文化 (Siebert, 2015)。整體而言，媒介學的「在中間／在中間的空間」與人類學的「中轉空間」都涉及了「轉變」，指出了技術即是「轉變」的過程。雖然，人類學關注的是人的意義，媒介學更關注的是物的操作，它們隱含的關聯仍值得後續更深入的研究。
- 7 亞里士多德是在討論「靈魂的知識」時提到了感受的媒介，雖然「靈魂的知識」對於亞里士多德而言是「理論知識」，然而基德勒所提

及忽視媒介的「理論」，在此顯然指的更是亞里士多德的「存有論」，也就是「形上學」。此外，基德勒指出，雖然亞里士多德將技術的知識排除在理論的知識外，然而，亞里士多德對於物的理解，仍是建立在「技術的知識」上（Kittler, 2009）。在此，基德勒所說的是亞里士多德將物理解為形式（μορφή/morphe）與質料（ὕλη/hulē）的觀點。基德勒認為，這個理解的觀點起於「技術的知識」。要能做出技術物，就必須給予質料形式——就像要將石塊做成建築，必須給予還未有形式的石塊建築的形式。整體而言，人們是在做出技術物時，才將物理解為形式與質料。因此，基德勒指出亞里士多德是以技術物的理解去理解物，卻又將技術逐出存有的探問外。（同上引）

參考書目

- 唐士哲 (2017)。〈作為文化技術的媒介：基德勒的媒介理論初探〉，《傳播研究與實踐》，7(2)，5-32。https://doi.org/10.6123/JCRP.2017.013
- 黃順星 (2017)。〈媒介史的末世預言：基德勒與麥克魯漢論媒介技術〉，《傳播研究與實踐》，7(2)，63-92。https://doi.org/10.6123/JCRP.2017.015
- Alloa, E. (2020). Metaxy: Aristotle on mediacy. In P. Michelakis (Ed.), *Classics and media theory* (pp. 147-1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J. (Ed.). (199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ford, A. (1963). The builders of the Parthenon. *Greece & Rome*, 10, 23-35. https://www.jstor.org/stable/826893
- Dotzler, B. J., & Schmidgen, F. (Eds.) (2008). *Parasiten und Sirenen: Zwischenräume als Orte der materiellen Wissensproduktion*. Transcript Verlag.
- Friesen N. (Ed.). (2016). *Media transatlantic: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tween north American and German-speaking Europe*. Springer.
- Gleiter, J. H. (2015). Condicio architectonica: Zum Verhältnis von Philosophie und Theorie der Architektur. In J. H. Gleiter & L. Schwarte (Eds.), *Architektur und Philosophie: Grundlagen. Standpunkte. Perspektiven* (pp. 39-57). Transcript Verlag.
- Jany, S. (2013). Postalische Prozessarchitekturen: Die Organisation des Postdienstes im Medium der Architektur. In F. Falke, B. Siegert, & J. Vogl (Eds.), *Mediengeschichte nach Friedrich Kittler* (pp. 135-145). Wilhelm Fink Verlag.
- Johansen, T. K. (1997). *Aristotle on the sense org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ttler, F. (1985).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Wilhelm Fink Verlag.
- Kittler, F. (1985/1990).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M. Metteer & C. Cullens, Tra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ttler, F. (1986). *Grammophon, Film, Typewriter*. Brinkmann & Bose.
- Kittler, F. (2009). Towards an ontology of med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 26(2-3), 23-31.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09103106>
- Kittler, F. (2013a). Homeros und die Schrift. In H. U. Gumbrecht (Ed.), *Die Wahrheit der technischen Welt: Essays zur Genealogie der Gegenwart* (pp. 342-350). Suhrkamp Verlag.
- Kittler, F. (2013b). Die Stadt ist ein Medium. In H. U. Gumbrecht (Ed.), *Die Wahrheit der technischen Welt: Essays zur Genealogie der Gegenwart* (pp. 181-197). Suhrkamp Verlag.
- Koch, M., & Köhler, C. (2013). Das kulturtechnische Apriori Friedrich Kittlers. *Archiv für Mediengeschichte*, 13, 157-165.
- Korres, M. (1995). *From Pentelicon to the Parthenon: The ancient quarries and the story of a half-worked column capital of the first marble Parthenon*. Melissa.
- Krämer, S. (2005). 'Operationsraum Schrift': Über einen Perspektivenwechsel in der Betrachtung der Schrift. In G. Grube, W. Kogge, & S. Krämer (Eds.), *Schrift: Kulturtechnik zwischen Auge, Hand und Maschine* (pp. 23-62). Wilhelm Fink Verlag.
- Krämer, S. (2008). *Medium, Bote, Übertragung: Kleine Metaphysik der Medialität*. Suhrkamp Verlag.
- Krämer, S. (2012). Punkt, Strich, Fläche: Von der Schriftbildlichkeit zur Diagrammatik. In S. Krämer, E. Cancik-Kirschbaum, & R. Totzke (Eds.), *Schriftbildlichkeit: Wahrnehmbarkeit, Materialität und Operativität von Notationen* (pp. 79-100). Akademie Verlag.
- Krämer, S. (2016). Is there a diagrammatical impulse with Plato? 'Quasi-diagrammatical scenes' in Plato's philosophy. In S. Krämer & C. Ljungberg (Eds.), *Thinking with diagrams: The semiotic basis of human cognition* (pp. 163-177). Mouton de Gruyter.
- Krämer, S. (2017). Die Rettung des Ontologischen durch das Ontische? Ein Kommentar zu 'operativen Ontologien'. *Zeitschrift für Medien- und Kulturforschung*, 8(2), 125-141. <http://dx.doi.org/10.25969/mediarep/18674>
- Krämer, S., & Bredekamp, H. (Eds.). (2003). *Bild, Schrift, Zahl*. Wilhelm Fink Verlag.
- Le Corbusier. (1925). *Vers une architecture*. Les Éditions G. Crès & Cie.
- Lucas, J. A. (1976). A history of the Marathon race: 490 B.C. to 1975.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3(2), 120-138. <https://www.jstor.org/stable/43609156>
- Lucian. (1905) *The works of Lucian of Samosata* (Vol. 2) (H. W. Fowler & F.

- G. Fowler, Trans.). The Clarendon Press.
- Ritter, J., Gründer, K., & Gabriel, G. (Eds.). (1971).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Schwabe.
- Shields, C. (2007). *Aristotle*. Routledge.
- Shields, C. (Ed.). (2012).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ristot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egert, B. (1993). *Relais: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als Epoche der Post, 1751-1913*. Brinkmann & Bose.
- Siegert, B. (2013). Cultural techniques: Or the end of the intellectual postwar era in German media theor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48-65.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488963>
- Siegert, B. (2015). *Cultural techniques: Grids, filters, doors, 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 (G. Winthrop-Young, Tran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Siegert, B. (2017) Öffnen, Schließen, Zerstreuen, Verdichten: Die operativen Ontologien der Kulturtechnik. *Zeitschrift für Medien- und Kulturforschung*, 8(2), 95-113. <http://dx.doi.org/10.25969/mediarep/18686>
- Stavrianeas, S. (2015). *Nature as a principle of change*. In M. Leunissen (Ed.), *Aristotle's physics: A critical guide* (pp. 46-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rnagel, J., & Schürmann, E. (Eds.). (2024). *Denken des Medialen: Zur Bedeutung des "Dazwischen"*. Transcript Verlag.
- Thomassen, B. (2014). *Liminality and the modern: Living through the in-between*. Ashgate.
- van Gennep, A. (1960). *The rites of passage: A classical study of cultural celebrations* (M. B. Vizedom & G. L. Caffee,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nthrop-Young, G. (2011). *Kittler and the media*. Polity.
- Winthrop-Young, G. (2013). Cultural techniques: Preliminary remark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3-19.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500828>
- Wycheley, R. E. (1978). *The stones of Athe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